

经济增长的代价

The Costs of Economic Growth

华 章 经 典 · 经 济

E . J . M i s h a n

25年后
最新修订版

〔英〕E.J.米香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经济增长的代价

The Costs of Economic Growth

华 章 经 典 · 经 济
E . J . M i s h a n

〔英〕E.J.米香 著

任保平 梁炜 等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E. J. Mishan. The Costs of Economic Growth, Revised Edition.

Copyright ©1993 by E. J. Misha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1 by China Machine Press.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Weidenfeld & Nicholson 授权机械工业出版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中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中国台湾地区）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

封底无防伪标均为盗版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法律顾问 北京市展达律师事务所

本书版权登记号：图字：01-2010-152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增长的代价 /（英）米香（Mishan, E. J.）著；任保平等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7

（华章经典·经济）

书名原文：The Costs of Economic Growth

ISBN 978-7-111-35220-4

I. 经… II. ①米… ②任… III. 经济增长—研究 IV. F06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25560 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2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责任编辑：蒋桂霞 版式设计：刘永青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1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170mm × 242mm · 13.75 印张

标准书号：ISBN 978-7-111-35220-4

定价：36.00 元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客服热线：（010）88379210；88361066

购书热线：（010）68326294；88379649；68995259

投稿热线：（010）88379007

读者信箱：hzjg@hzbook.com

修订版前言

重读我于 25 年前撰写的《经济增长的代价》第 1 版后，我陷入了矛盾之中。如果第 1 版在未做修改的情况下依旧在今天被重印的话，那么除了第 2 章中某些描述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篇幅以外，我相信它与我们今天的时代仍密切相关。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忏悔（可能是令人羞愧）的是，我无法抑制自己少许自满的情绪，已发生的种种事实实际上已经证实了我以前所提出的预警。同时我无法避免一种沮丧感，尽管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在过去的 20 年内日益提高，但本书第 1 版中所提到的那种难以应付的状况和社会变化趋势却一直在持续。

最近，英国政府对于明显扩散的环境恶化所采取的不够明朗的政策反应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我也在《威斯敏斯特国家银行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本书第 6 章的内容就是以此篇文章为基础撰写的。另外，除了明显升级的巨大的全球风险外，我偶尔也关注城市交通拥挤和难以调控的游客人潮所带来的问题。在精心调整和重新安排论述顺序后，把第 8 章放在城市问题的后面是比较合理的，第 8 章主要讲述了由于科技进步所产生的难以应对的社会问题。因为很难将经济进步的人文和社会影响与货币的测量标尺联系起来，那么与有形的物质效应相比，它们很少得到人们的系统性关注。

那些读过本书第 1 版的朋友将注意到修订版的另一个特征：插入第 6 章的意图是想说服更多的读者，尤其是那些易于被官方统计的经济增长数字所迷惑的人们，统计数据测算出的一定时期的实际

人均收入的增长与人类福利的下降是可以并存的。我再次感谢《威斯敏斯特国家银行评论》的编辑允许我引用我之前的文章。

虽然第 1 版的大部分内容能够得到广泛认同，但偶尔也有一些异议，我把它更多地归因于评论者的思想意识，而非对于我的观点的深思熟虑的评价。当然不同意见并未与我的论述产生根本性分歧，而只是对已形成的结论做出下意识的反应。对本书的评论者来说，他们懂得利用机会来表达自己的个人哲学和信条。

通过本书，我也试图阐明普通人的福利水平是试金石这一观点。因此，我所提出的观点不是价值判断，而是对事实的判断——问题变成了究竟是哪种发展促成了一定含义下的幸福生活。与某些不负责任的论断相比，我们不是回顾神秘的黄金时代，也不是试图表明某个特定的国家在“往昔的时光”中的任何方面都比现在要好。另一方面，我确实想使那些心胸开阔的读者相信，如果价值判断标准是人类的福利水平，那么自 20 世纪开始以来，更确切地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西欧和北美所发生的变化带来了负面效应，并且不太可能出现好转的迹象。

当今的大多数人不会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生活的感受，而那些有此记忆的长者却易于忽视这一事实：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1919 ~ 1939 年），几乎所有现代社会的粗暴特征都鲜为人知。20 世纪 30 年代英国的失业人口平均保持在 200 万人，然而（毫不奇怪）物价却保持稳定，而且政府也不用忍受大量工资抗议浪潮，更不用担心自己在经济增长联盟中的排名，或一直痛苦地把自己的主权交给欧盟。

在那些单纯的时光里，环境一词被看成是一个文学词汇。核武器、大屠杀属于科幻范畴，热带雨林的破坏、臭氧层的消散以及温室效应都是难以想象的，我们也从没想过生态环境会因酸雨、化学杀虫剂和人工化肥而遭到破坏，还有石油泄漏、被污染的海滩和近海、“死湖”、被浮渣和污水厚厚覆盖的河流，人工笼养母鸡和工厂化的农场更是闻所未闻——农场已然不是农业了。

安静祥和的郊区已成为过去式。那时，人们的双耳不会被低空飞行的飞机或邻居家的立体音响所骚扰，当然更不会被刺耳的链锯声和长鸣的割草机所烦扰；在英国海边的度假胜地，还能闻到海水的咸味；地中海沿岸还没有因“经济发展”而遭到破坏，海水清澈到可以在里面洗澡。

人们无法摆脱“种族偏见”和“性别歧视”，以前有关于道德和财产、语言和文化的一致观念从未像今天这样被粉碎瓦解。破裂的婚姻、未成年女孩怀孕和流产在过去罕有发生，对于“单亲家庭”人们更是闻所未闻，大量同性恋、“同性恋热线”电话服务和“同性恋”酒吧以前从未出现，而现在各种“稀奇古怪的集会”甚嚣尘上。现在，在“反对堕胎”和“赞成堕胎”两个阵营之间、在从事研究的科学家和“动物权益”运动之间、在花花公子及性解放和愤怒的家长及保守的人之间，充斥着大量难以缓和的对抗情绪，而这些在过去都是难以想象的。露骨地表达性行为 and 性虐待的作品在今天的书报亭和音像店已经随处可见。

那时，很少有人知道电视机的存在，计算机的生产还未成为商业提案。人们之间更多的只是一些无伤大雅的敌意，而非愤恨。圣诞季从 12 月开始，而不是像现在这样，9 月就早早拉开了序幕。我们现在所谓的“垃圾邮件”在那时根本不存在，也无须在电话前没完没了地等待，不用在超市收银台前排队付款。那时聪明并且学历高的店员有很多，可靠的手工艺人更是随处可见，而“牛仔式”的水管工、建筑工人还没有出现。

城市中的交通拥挤、停车问题，高速公路上绵延数公里的交通堵塞，当然还有足球流氓、种族暴力、与警察的冲突，在那时都不是生活中的显著特征。尤其是人们在白天和晚上沿街散步很安全，“行凶抢劫”和强奸明显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开始出现的。

我们还可以继续罗列下去，但我想这些就已经足够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道德的沦丧是如此惊人，这促使我们去思考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否值得？可以肯定的是，上面的描述所隐含的假设是，后来出现的这些灾祸在某种程度上与技术进步和工业化扩张有关，而技术进步和工业化扩张又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因此，本书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足够清晰地证实这一假设是完全正确的，即西方世界的经济增长进程必定引发了一系列难以克服的社会问题。

事实上，某些观点或想法在书中会多次提到，这不能完全归咎于我的粗心大意。除了不断强调的要求外，某一观点可能会在不同背景下出现，并引出不同的

含义。举例来说，伴随着技术进步，新增的航线提高了旅行的速度，同时扩大了旅行的范围，并降低了旅行的实际成本，空中飞行技术的发明产生了与经济增长争论相关的几种后果。外界环境受到的影响被放在本书第6章，大量游客和南北移民所带来的利益冲突将在第7章被加以强调，这类冲突被放在导致国家干预和调控所引起的个人自由权利空间萎缩的冲突之中。

除了详细阐释一些建议外，例如在一些福利分隔区颁布一系列的生活福利权方面的法案，这些都是我在本书第1版中提到过的，目的是为那些感觉自己不断陷入巨大生存压力中的人们提供能对他们的生存状况有所帮助的建议，但我发现，以乐观甚至满怀希望的感情结束是不可能的。就我个人来看，不断扩大的地球家园的孤独无力感只是暂时的，像在书中描述的那样，被喧嚣、疯狂和冲突所淹没——这些都是来自于不断扩张的技术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同时我急切想补充的是，这种孤独感也包括西方世界人们精神上的孤独，而这种精神孤独就是科学胜利的馈赠。

每个人都渴望奇迹的出现，诸神显灵，神秘之光普照宇宙，云端的上帝与我们对话，凡此种种。但直到那一天结束时，我们仍在做着婴儿似的启蒙运动，徒劳地寻求世俗欲望的满足——追求权力、快乐和兴奋，这注定了我们过着丧失信仰和漫无目标的日子。

对未来的进一步预感而非预见，可能会改变沮丧的本质。虽然我曾在较早前的文章中这样做，但我不会在本书中猜测人类在消费者利益与科学团体利益之间以决定性的斗争为终结的冒险行为。

商业团体通过扩张市场而获得繁荣不仅依赖于人均购买力，也依赖于世界人口的规模。在我写作本书时，世界人口超过了50亿，并且以每年1亿的速度增长。虽然在有灾难（文章中已讨论过）的情况下，每年人口的增长速度将会上升，但它还不足以满足商业世界的需要。另一方面，对科学团体而言，世界人口越多，对于他们了解宇宙秘密这个主要目标来说，偏离就会越远。因为世界人口的规模越大，我们每一天的生产消费对于地球资源的需求就越大，对于能源和空间的需求就越大，而这一生产消费过程被看做是把地球上的物质资源转化为液体、固体和气体废弃物的过程。

理性的科学家必然会把这一过程看做是对人类自身权利和智慧的践踏，从而把对知识的追求转向无代价地维持一个特大规模的人口。从严格的科学角度来看，超过 99% 的人口都是消耗型的，都在使我们的星球更为混乱，都在贪得无厌地消耗着地球资源，在无法避免地破坏着数以千计的动植物物种，在扰乱着企业家和科学家的主要目标。

科学团体应该支配和控制社会吗？如果政府体系崩溃或发生一系列全球性灾难并带来恐慌，那么，首要任务是迅速减少世界人口，并实现通过化学方法在两代人之间阻止人类过快繁衍的目标。正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历史将完全结束，纯科学的时代将会来临。

虽然这样的描述看上去很诱人，我在本书中还是忍住不去猜测可能的未来，像第 1 版一样，本书更多地关注与经济增长相关的当下的重大问题。当我写作上一版时，我就意识到了来自于伦敦经济学院同事的看法，他们习惯于把我偶尔对 20 世纪 60 年代期间经济增长进行批评看做是一种可爱的奇特行为，我努力保护自己的侧翼来应付反对我的观点。虽然不能说在新版本中我不顾一切地豁了出去，但整体而言，我的论述仍未能详尽。

确实如此，我在第一部分中对经济增长批评的再次推进（除了第 10 章），几乎完全是在大家接受的经济学假设框架之中——关于福利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框架却一直在发展演变（学生可能会好奇地想知道主流经济学能考虑多少社会福利问题，对此可以参考我的《规范经济学》）。即使在这种可接受的经济学前提和关系的框架内，限制分析对于个人选择领域扩展的目标——持续追求经济增长的普遍的理性主义是经不住仔细推敲的。

现在转向经济和技术增长的后果，它们无法被准确纳入到经济分析的传统框架中，秉承“小心即大勇”（discretion is the better part of valour）的原则，我将我的观点归类于一个大概 40 多页的所谓“离题内容”中来，即关于“无法测量的经济增长后果的更多细节描述”，从那时起我就勇气倍增。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中，我也敢于对我们所谓的生活质量进行系统而具体的思考。正是在第二部分中，读者被驱使着去思考自己所处的物质环境以及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他可以设身处地地感受这些变化对普通人身上流淌的愿望、品质以及最终的情感满足所带来的影

响，这些变化不仅仅来自于不断增长的丰裕物质，更多地来自于日新月异的技术变化，来自于消费品和服务、生产和经营方式的革新，而现代经济增长使之成为可能。

显而易见，比起本书第1版，本版所提出的讨论是更具猜测性的，范围也更广泛。这些思考不能依赖于在专业期刊上发表的学术型文章的理论。即使我对于目前趋势的阐述和我对经济增长价值的明显怀疑将会受到挑战，但是，毋庸置疑，在任何关于我们为之奋斗并逐渐成形的文明所进行的讨论中，我在第二部分中所提出的问题都是极其关键的。

第1版中的4个附录依旧被保留下来，虽然从应用的角度讲，收支平衡的有关内容过于简单，这些内容可能对于初学者来说不是很有用，它们对于理解文中的论述也不是必要的，但它们的主要目的在于说服那些主流经济学家，那些可能会简单浏览本书的人。如果我对于自由贸易优势的批评、私人交通所带来的优势或人们熟知的长期技术性失业的怀疑在表述方面与主流经济学有所偏离的话，那么他们确实应该认真思考。

对于年轻的经济学者或没读过本书第1版的人，一些解释可能是必要的。因为他们可能会发现在下文中没有现在流行的可持续经济增长的观点。从最初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哈罗德—多马动态模型开始，在20世纪50年代产生了一系列相对原始的增长理论，例如索洛和斯旺创立的增长理论，紧接着是更为完善的由菲尔普斯等人发起的均衡经济增长路径的“黄金律”经济增长理论。正如可以预期到的一样，理论上更加复杂的模型在后来被构建出来，包括多部门模型，其中环境和其他约束变量也被引入到模型之中。如果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经济理论都列出来作为对文章的指导，那么日益增加的对数学精湛技巧的要求可能会导致把更多的时间花在精心构建复杂的模型上面。

有关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型与未来发展相关或与人类福利相关的表述都是学术上的口吻，这些经济增长模型的目的在于精确描述几个“关键”变量之间的关系。这些变量自身的特征限定了模型的特性，这些特性将确保发展过程的持续进行（例如，较简单的模型可能会包括储蓄率、资本收益率、技术进步率、人口增

长率，这些变量中的每一个可能都与其他变量相关)。但是这类模型仅仅解释了在某种条件下保持一种不变速率的无限经济增长，当然总是假设构建的模型依赖于主要的经济变量。

虽然这种分析方式是一些经济学家的兴趣所在，但这些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理论几乎不能为国家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任何有用的信息。因为事实上在大多数时候，施加在这些关键变量上的作用和影响是非常有限的。一方面，就过去 40 年的趋势来看，对人口增长、储蓄率与技术进步率而言，国家之间差异都很大，对于未来的预测几乎不可信。我们可能会预见在重要经济部门中技术的收益递减现象，但我们无法预测未来的创新模式。

其次，引入创新所带来的生产和消费方面的后果，通常易于反应过快或过迟，而且会对净生产率产生反作用。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后文将要谈论自 20 世纪初以来主流创新对我们的生活质量产生的巨大而难以应对的潜在影响，同时这些后果的本质是它们均来自科学技术的发展。

尽管下面一段论述对经济增长的含义这一主题探讨仅起到告诫的作用，但它是值得被强调的。

我在 1966 年写作第 1 版时，失业率并不高，尽管财经评论者在英国与欧洲其他国家之间习惯性地做出不公平的对比，我们的经济增长学家也还是对未来十分乐观。虽然我不担心就业的前景，但我后来意识到我对“经济增长”这一词汇的使用会被错误地阐释。在各式各样的学术会议中，我偏激的观点和看法遭到了其他经济学家的攻击（虽然他们没看过我的书或理解得不深刻），他们言辞巧妙地谈论增长停滞所带来的成本，并坚持认为一个滞胀的经济将激化资本与劳动的冲突，将向社会大众传播失望、悲惨的气氛以及导致政治不稳定，等等。

这种源自于对我的书籍题目的误读应该不会再次在本版上市后出现，因为此时英国的失业人口接近 300 万，经济在下滑，社会前景暗淡，政府不愿意通过增加公共支出来刺激经济。

我再来更清晰地加以描述。首先，当衰退发生时，我和其他经济学家一样关注衰退的深度和波及面，当然我也有个人的解释和看法（其中一些观点在附录 A 与附录 B 中），但在文中我对失业问题着墨并不多。我主要是想强调一个完全不同

的问题：无论是在经济繁荣或萧条的情况下，持续经济增长对于社会福利的影响。更具体地说，我关注的是在可预见的未来，持续的技术增长对于我们生活质量的影响及其带来的其他后果。

为了避免读者被提出的论题搞得混淆不清，我在此建议读者假定存在一种稳定的就业和令人满意的收入分配水平。事实上，如果我的观点是合理的话，那么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棘手后果即使在最完美的经济大环境中仍会持续发生。

按照传统的说法，我欠了很多人情。本来的意图是使我的阐述具有前瞻性，但我觉得没有义务要引经据典，也不后悔从自己早期文章中节选部分内容。我本应早点感谢同僚们给予的帮助，但由于这本书的修订版是在我退休之余完成的，因此缺少了同僚们的品评和建议。如果读者在文中偶尔遇到晦涩的文字和混乱的叙述，请你们耐心地看下去。最后，我要感谢伦敦经济学院的 Marianna Tapas 女士，她打印了完整的稿件，并修改了一些语法上的错误。我还要感谢《威斯敏斯特国家银行评论》的编辑们，在他们的许可下，我得到了文中一些关于 1984 年和 1990 年的资料。

米香

1992 年 8 月

导 言

与那些强调要面对变革的流行观点相反，一些宣称自己是新思想领袖的人经常被证实仍然徘徊在经济教条中，其中许多经济教条还是由过去的著名经济学家提出的，以作为他们那个时代制定政策的依据。至少对英国来说，自由贸易、自由竞争、持续的经济增长、人口的自由流动是 19 世纪占支配地位的经济目标。但在 20 世纪之初，它们却全然无关了。事实上，人们本来可以坚持这些教条，不用像现在这样自欺欺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因为只有在战后欧洲复兴的第一阶段里，人们才发现了与以往的不同，并且从这个角度开始怀疑这些曾经的自由主义信仰与由日新月异的科技带来的巨大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些发展中比较显著的有：（1）前所未有的通货膨胀，我们已开始察觉到它对生态环境的影响；（2）突飞猛进的技术进步，这必然引起知识技能和文化体系的不断落伍，无论对于高深莫测的还是浅显易懂的事物都是一样；（3）西方世界战后财富的增长，这导致了大量媒体的诞生，尤其是电视的大量涌现、汽车拥有量的提高、空中旅行和大规模的游客潮，这些现象的出现在几年之后就造成了一系列的复杂问题。虽然这些发展的突然降临让我们猝不及防，但人们可能认为，对社会福利的适度关注本应该表明我们忽略传统信条的智慧，并且提醒我们去思考身边正在发生的那些变化。

可能有更好的说法来解释为什么上面所提到的事情还未发生。可能因为我们的政府组织机构较好地适应了这个更加从容的时代，

即社会不公可以得到补偿，问题在产生时就能得到解决，并且在发生重大事件时，人们能感觉到有所保障并足以使自己有时间去重塑和调整。对体制而言，只需要通过知识和经验的缓慢积累来得到改变。就我们的物质环境而言，它可以依赖自身的调节机制来维持平衡并保持不变，因而人们可以调整自己对于熟悉事件的观察视角；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人们也会自我安慰，哪怕是只存在于脑海中的幻想，或者呈现形式不同但内在本质都相似的事实。

而且，人们没有采取预防措施，也可能根本做不到，因为这种预防措施将可能使人们思考和判断由此而产生的对普通人福利的影响。大量涌现的科学技术产生的压力将分解我们的制度框架，腐蚀我们已建立起来的道德基础。人们在工作期间，思维和智力已经成型，几乎没有任何动力把精力转向这类问题。无论是在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领域，学者们并不是在努力了解自己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而只是在苦苦追求通过公开发表自己的科研成果并以此来得到别人的认可——试图缩窄而不是拓宽他们的研究领域。经济学家也不例外。虽然许多经济学家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反对数学方法上的创新和理论的一般化，但他们也不会大声质疑近几十年来西方社会的物质增长是否促进了人们的幸福感。他们可能会认为这方面的研究最好留给对社会问题较为关注的业余爱好者们去讨论，这个世界上还有更为重要的东西等着他们去研究。无论如何，这种宽泛的问题无法进行系统化的描述，无法简单地使用社会科学中的纯粹技术性工具加以讨论，也不能脱离不断更新的“价值判断”。而且，那些胆敢挑战传统和习俗的社会学家们必须准备好忍受来自于固守教条的同盟者的巨大打击，这些人有比你更大的热情来捍卫他们的方法论的纯洁。

无论怎么解释，我们都生活在自我矛盾的环境中。尽管可以把耶路撒冷的经济增长模式带到英格兰那片热土，但后果却将是对英格兰环境的巨大破坏。经济增长仍然是目前政治词汇中最令人敬仰的口号。时至今日，年轻的一代也在为能掌握大权而奋斗，并习惯性地漠视所处时代的新的社会冲突和矛盾。他们在不停地强调父辈们的信条，根本不关注物质繁荣所带来的问题，他们口口声声坚持融合“新”和“变”、“现代”和“活力”，就像它们才是重要的美德，仿佛事实上

只有科学才能给予我们所有的拯救——以及通过更多的思想传播。说服公众支持和维护战后构建的保护性设施能够使他们不用再向公众灌输强迫症式的训词。经济指数本身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物，事实上也仅仅是一个数字而已，人们却把它当做神一般膜拜。显而易见，人们不得不求教于数字来掌握整个社会的情况。对于大批的信仰者来说，任何对于数字的怀疑都被看成是异端邪说，正如像数据所揭示的那样，一个4%的增长率优于3%的增长率，因为这样对国家更有利，而怀疑论者却好像在说4不一定比3好。他们认为这样的怀疑无异于怀疑这一观点，即经济增长就像知识增长一样是一个好东西。然而，因为经济增长对我们的福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可能是最主要的影响），所以我们将专注于福利、安康、满足感或者幸福感，这些指标或许无法量化，但却非常有意义——不要再用数字体系代替它们，正如我在下面篇章中提到的一样，完全有理由怀疑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数据之间是否存在正相关性。

这些因素的影响并没有被专业人士完全忽略，然而我想表明的是，它们对于社会福利的影响程度被明显地低估了。这些因素的特性在经济学家对完全竞争体系的批评中已有所展现，而完全竞争体系在任何时候都被认为能够理想地进行资源配置。如果用经济学家的行话来说，自20世纪之初以来，它们就被认为是外部不经济或者“溢出效应”的标志。

然而还有其他方面的批评（至少是担忧），这些可能远超出了溢出效应的范围。对于这些其他的批评来说，并不是因为它们本身符合逻辑或对某些特殊机构施加了压力而具备合理性——正是通过这些机构，不断增长的社会资源和产品才得以分配。一个在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委员会指导下的富裕社会的经济增长，可能会比非集权的自由化企业组成的社会系统更不易受到这类批评的伤害。

把这些批评形式化将是一种令人高兴的大脑锻炼，只要能将它们包含在经济领域中，就能加强它们对从事经济学研究者的启发，但实际上却做不到这一点。那些认同我的观点的经济学家可能不得不接受许多其他观点，而这些观点不能被完整地融入到福利经济学研究框架之中。

我所希望表达的观点总结如下：流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关于“保守主

义”与“自由主义”的两分法，从专业术语角度看，即传统主义者和守旧派与“现代主义者”和“领跑人”的两分法，它们混淆了我们的视线，使我们看不清所面对的主要问题：究竟是试图通过调节环境来适应人类的天性，还是恰好相反，调节人类的天性，使之顺应于被“效益角度”即技术进步所主导的环境。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其他词汇，即我们在“直面改变”和“走老路”之间面临抉择，只要我们能够将“直面改变”从纯粹冲动的惯性中分离出来，更具体地说，是从我们“先导者”具有权威性的标准中分离出来——日益激烈的竞争、不断攀升的出口、不断提升的技术效率，当然还有迅猛的经济增长。那些习惯如信仰一般坚定的人已经不耐烦地催促我们赶紧进入未来，虽然看上去很艰难，但它绝不是迎接 20 世纪^①唯一的选择，他们只是扬起风帆去追逐风向而已。“面对的是 20 世纪”这样的说法可能更加关乎人们的需要，只要工业进步是由赞成自由经济教条的古老假设所指导的，那么在蒸蒸日上的新兴技术力量面前，人们就可以投靠工业进步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信仰。用更积极的方式来说，年轻的一代只有在自己通过对一系列即将或已产生的后果的认真思考后才能面对真实的未来（那些有形的、无形的，确定的、不确定的），只有这样做才能正确地走向未来；才能意识到古老的自由经济的和谐将不复存在，而不得不做出许多痛苦的抉择；才能明白某些情况下，人类的需求与技术的需求将被证明是无法和谐共处的。

我知道自己的许多观点经不住所谓的科学检验，也没有为许多观点提供相应的证据。对此我的看法是，现有的知识体系存在不足，而不是我的观点有问题。由于现实事件变化的速度超过了我们统计分析技术所能达到的更新要求，因此我们无法改进统计方法来估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多溢出效应的大小。然而正是我们对数字的过度信仰，才导致人们片面认为无法数量化的东西都应被抛弃。这是一种在研究工作者中间普遍存在的强烈偏见，他们不承认不可测量的事物的影响力远大于可测量的事物的影响力。在许多情况下，基于这些可测度的数据形成的结论都是不可靠的。

另一种可能性是，因为我们无法估计这些增长的溢出效应或“社会成本”，

① 原文为 20 世纪，但怀疑此处有误，应为 21 世纪。——编者注

在不远的将来，应该迫切使它们以最生动化的形式呈现于公众的视线前，而非让作者将它们归于充满歉意的脚注。对于更多意外的社会影响的大小仍未有人做出过统计，或者极可能会做出。这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促使经济学家们偶尔关注他自己的感知，如果未来这个趋势仍然无人问津，那么这个事实也不阻止合理的猜测。

对于快速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原则上并不容易进行测算，人们也不能坐等更有效和归纳性更强的方法出现才去思索这些问题，因为它们看上去比可测量的东西更好预测。吸引读者的必然是以熟悉的经验和直觉的形式出现。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我屈服于那些优秀的经济理论家的话，我就不可能完成本书第6章。在那一章，人们的偏好被看做是数据，人们的选择是终极原因。对于纯粹的经济学分析来说，无论是可观测的人们欲望的特质或标准，还是人们在行业或技术发展的影响下如何变化，都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而这种微不足道的东西不必成为应用经济学的内容。事实上，如果应用经济学家认真考虑人类福利，那么已存在的经济组织和技术创新对于标准偏好、行为标准和人们性格的影响作用将是十分重要的。

当然，有些人可能会宣称，在一种毫无目的的偏好变化的过程中，一个人对《超人历险记》的喜爱超过了对弥尔顿的《失乐园》的喜爱程度，你也可能认同对某爵士乐的偏爱不会低于对贝多芬交响曲的偏爱，但事实上没有人这样认同。就算有人真的相信，我们也不会那样做。

我们会毫不奇怪地发现，一个沉溺于《超人历险记》的孩子长大后会对原来《超人历险记》的剧情丧失兴趣，而把偏好转移到《失乐园》上来。如果一个人不是老糊涂的话，他不可能把对莎士比亚和弥尔顿诗歌的热爱转向《超人历险记》。总而言之，偏好确实可以排序，无论是正确或错误的。社会应该停止为偏好排序吗？如果这样的话，艺术、音乐和文学将不再有人教授。

我再一次表明我的看法。尤其是当我看到不幸的事情在不断发展演化时，后人可能不会介意活在那样的环境中。毕竟，人们终将适应当时的环境，即使那种环境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是令人厌恶的。但最终的问题是，人类能否适应发展变化

的世界是一个问题，而提高生活的质量则是另一个问题。无论这种观点何时触及我们对当下的看法，我们都拒不接受，这将被我们对目前的权力滥用的反应所证明。显而易见，人们认为提出这样的想法不合适，即社会的阴暗面无人管理，直到人们开始变得麻木不仁从而不再关心它。

如果我没有不计后果地在第7章中列举一些幸福生活的必要条件，我就不能再进一步地强化和表明我的观点。所以如果人们真能成功地适应迅速提高的技术进步及其各种好处，那么他们也就真的远离了幸福的生活。或许在生产力和科技变得更加进步的同时，人们也将变得麻木、自闭、现实和浮躁——即使人们满足于现状，也无法改变这一切。

然而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未能真正适应这种全新的现实世界。非正式的数据表明，从精神紧张的角度看，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动力以高成本的代价在维持着。也有证据表明，西方社会的文明携带着自我分裂的种子，这一点在第7章中将有所涉及。

我不认为第7、8章中的描写是没有关联的，在其中可能会有一些观点远离现实而得不到充足证据的支持。总而言之，只要我有机会，就会系统地表达我对于技术进步、对我们现实世界未来和现在的影响的担忧。但我也承认，我抱有这样的希望，即一些读者在掩卷之前就能被我说服，并较之以前更加审慎地关注未来的变化趋势。